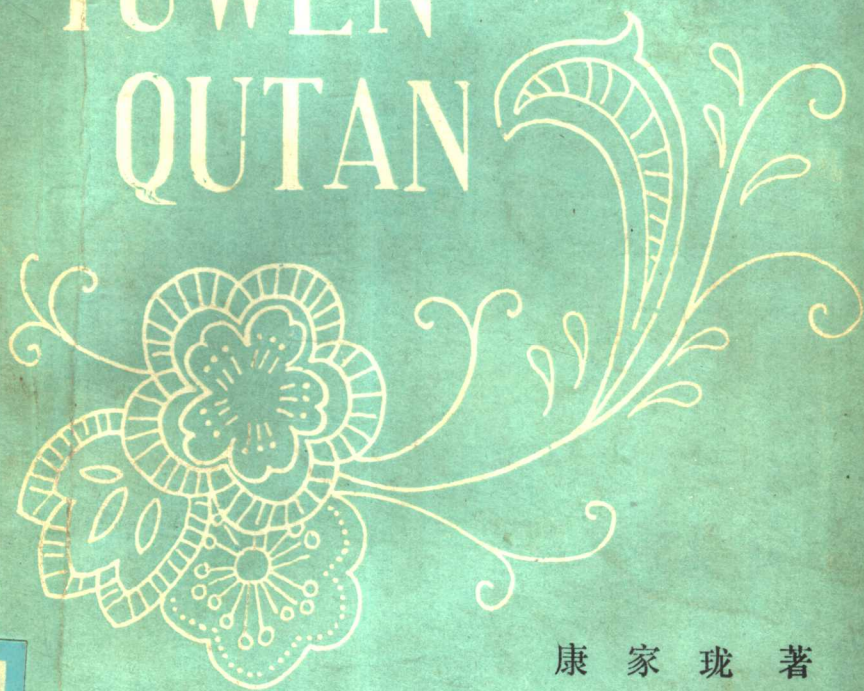


YUWEN QUTAN



康家珑 著

语文趣谈

YUWEN QU TAN
语 文 趣 谈

(增 订 本)

康 家 珑 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说 明

本书从一些轶闻趣事入手，介绍语言文字方面的有关知识。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和通俗性。可供初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本书原版共有二十六篇文章，这次修订，又增加九篇，共为三十五篇。

YUWEN QUTAN

语 文 趣 谈

(增订本)

康家珑 著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双桥郎各庄印刷厂印刷

789×1092毫米1/32

4 $\frac{1}{2}$ 印张

100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统一书号：9240·024

定价：0.70元

前 言

语言文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社会现象。可是，在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的心目中，它似乎是一种枯燥而又乏味的东西。尽管他们运用语文的水平很低，但还是对学习语文不感兴趣。“兴趣”几乎成了普及语文知识的一个大问题。在从事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我也常常为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而皱眉。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任何人对于任何学问，不管它是有趣还是枯燥，只要产生了兴趣，他就会得到一种无形的推动力，产生自发的求知欲，为觅取知识，研究问题，他可以废寝忘食，达到一种令人不解的入迷境地。为了激发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兴趣，我试写了这本小册子。

《语文趣谈》共有三十五篇文章和一个附录，大致按现代汉语通论、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顺序排列。它们分别从一些轶闻趣事入手，介绍了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附录则分别辑录了中国语言文字之“最”，试图为这方面的学习提供一些简明的知识线索。本书力求做到知识性、趣味性、通俗性相结合，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允中先生代题书名，特表示感谢。

康家珑

1982年3月

目 录

法拉第的教训

- 谈语言是交际工具····· (1)

华罗庚的读书法

- 谈语言是思维工具····· (4)

皇帝与语言

- 谈语言没有阶级性····· (9)

答非所问，啼笑皆非

- 谈普通话····· (11)

鲁迅“责骂”许钦文

- 谈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 (14)

东郭牙泄密

- 谈音节的分析····· (18)

黑齿国姑娘笑秀才

- 谈反切····· (21)

欧阳修改稿

- 谈节奏····· (24)

王姐夫告状

- 谈汉字的性质····· (29)

“凤”中有讥

- 谈形声字····· (34)

一字之差苦煞全家

- 谈错别字····· (38)

一张争猫的状况

- 谈词缀····· (42)

孔子不饮“盗泉”之水	
——谈词义·····	(44)
巧嘴媒婆	
——谈多义词·····	(49)
大闺秀的求婚对	
——谈同音词·····	(53)
望梅止渴	
——谈词语的形象色彩·····	(56)
欧阳修联语讥尚书	
——谈古语词·····	(59)
爱因斯坦“应试”	
——谈工具书·····	(62)
小气鬼做帽子	
——谈修饰语·····	(68)
“揭被勒缚”与“勒缚揭被”	
——谈词序·····	(73)
傻女婿祝寿	
——谈词语的搭配·····	(76)
“谁发现了美国？”	
——谈多义句及其辨析法·····	(79)
能耍魔术的短诗	
——谈标点符号·····	(83)
梁王劝说惠子	
——谈比喻·····	(87)
沈括的责问	
——谈夸张·····	(92)

贝多芬的演奏为何引起骚动	
——谈排比·····	(96)
肖伯纳无法翻译的字	
——谈婉曲·····	(99)
郭沫若少年对对子	
——谈对偶·····	(101)
一封巧妙的情书	
——谈镶嵌·····	(107)
罗嗦先生的家信	
——谈繁简·····	(110)
刘大请客	
——谈表达方式·····	(115)
李方膺画风	
——谈联想·····	(118)
郭老的一字之师	
——谈语气·····	(120)
歌德让路	
——谈语言美的标准·····	(124)
高适细察出佳句	
——谈语言美的源泉·····	(128)
附录:	
中国语言文字之最·····	(132)

法拉第的教训

——谈语言是交际工具

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法拉第，曾经对光的电磁学说提出过基本理论，但由于他不善于表达，文字晦涩，又缺乏数学说明，所以，当法拉第第一次提出电磁学理论时，他的理论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一直到麦克斯伟用明白流畅的语言和数学方法对电磁学说进行说明之后，才得到世界的公认。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法拉第的教训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会正确地运用语言文字，就很难做学问，更不能进行研究。就是不想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有所突破的人，也应该学好语文。

苏联教育家加里宁在给中学生讲语文知识的重要性时，曾经讲过一段很有风趣的话。他说，有一个青年人很想写封信给他自己的情人，他写道：“亲爱的，我爱你爱得没有止境（笑声）。我的心情是这样的热烈，我简直无法形容，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才能表达出来（笑声）。”假如这个情人是个普通的幼稚的姑娘，当然她就会说：“妙极了（笑声）。”但假如她不是一个幼稚姑娘，不是一个普通姑娘，而是一个很有学识的姑娘，那她又会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个姑娘一定会说：“可怜的孩子啊，你的脑袋怎么这样笨啊！”

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人物都很注意学好语文。

俄国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1879年用一个备用

的笔记本，记下了这样几段话：

“使……没有粮食，使……没有马匹，使……没有森林，使……没有力量。你使我无力……我习惯骑马了，习惯，我习惯学习了，或者生疏了，我和我妻子处得来了，顽皮了……。”

“手不老实”，“你想向前去，但是腿却朝后拉。”

“她比不了他，大大地比不了，谁比得了，谁也不能和他相比——谁也比不了的人……后悔——没有后悔，是后悔的时候了，后悔莫及，后悔得连东西都不愿意吃了……吃斋——吃斋吃够，已经斋戒第二年了，我已经斋戒完了，斋戒到期了，因吃斋瘦得象一根线……。”

这是写什么呢？开始人们一直闹不清楚。后来，一些托尔斯泰的研究家们才搞清楚，这些没有逻辑联系的杂乱的语句，既不是记的日记，也不是构思作品的草稿，而是托尔斯泰在作组词练习时写下的各种类型的句子。那时列夫·托尔斯泰已经五十多岁了。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先后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些都被广大读者视为文学巨著。但是托尔斯泰却仍然象小学生一样，经常地进行组词造句的练习。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很感人的。

学好语文，除了学好本族语言以外也包括学好外族语言。“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我们多学习一门外国语，就象多给自己开了一个天窗。恩格斯一生勤奋学习外语，他的外语造诣是非常深的。他能用十二种语言说话、写文章，能阅读二十种文字。他通晓欧洲各国语言，甚至连某些方言也很熟悉。恩格斯具有广泛的兴趣，语言学是最先吸引他的“老爱好”之一。直到七十高龄还开始学习挪威文。

丰富的外语知识给恩格斯的斗争以巨大的助益。恩格斯借助语言这一有力的工具，广泛地阅读专业文献和世界文学作品，密切注视外国报刊关于工人运动中理论问题的动向，充分利用原始资料来研究各种理论和观点，进而对国际政治情况迅速而准确地作出判断，及时而有效地指导斗争。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高语文水平。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交际的范围和手段也在不断扩大。过去语言只同文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等有联系，而今天，它同数学、生理学、物理学、电子学、信息论、控制论、符号学、计算技术、通讯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学科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语言科学正日益向精密科学靠拢。客观现实要求语言学同这些学科共同解决一些边缘性的课题。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给语言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同时也给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与现代科学技术关系极为密切的机器语言学，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越来越显示了它的重要性。

要搞现代化建设，如果没有较高的语文水平，就不可能理解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语文上的混乱和错误，轻则不能准确地表达思想，降低工作效率，重则在政治上、经济上会造成严重差错和巨大损失。因此，任何时候，我们对语文都不能等闲视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十分重视语文的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说过：“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

非学习语言不可。”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指导《新华日报》工作，“对文章中的每一个字的运用都是异常慎重的。”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决不能有丝毫马虎，如一句话错了，一个字错了，都有关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郭沫若同志指出：“一个青年必须有三大基础：思想基础、科学基础、语文基础。”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我们青年正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千万不要重理轻文。

外国教育很重视语文教育。比如西德语文教学界特别强调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德语语文教学袖珍手册》一书曾经就说话训练的任务做了专门阐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青少年）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方面的交往能力，除专业知识之外，不仅以语言知识而且特别以说话能力和本领为前提。”

西德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我们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时候，社会也千万不要重理轻文。

华罗庚的读书法

——谈语言是思维工具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一种奇特的读书方法。他在灯下拿起一本书，不是从头至尾一字一句地读，而是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他设想，这样一个题

目如果到了自己手里，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想完后打开书，如果作者写的和他的思路一样，他就不再读了。一本本来需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读完了。

华罗庚养成熄灯之后在黑暗中“想书”的习惯，实际上也是一种“读书”的习惯。它与我们通常的朗诵所不同的，只是它使用的是内部语言（即没有说出声来的语言）；朗诵使用的是外部语言（即说出声来的语言）。语言不但是人们进行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人们进行思维的工具。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可能脱离语言材料进行思维。只要我们神智清楚地思考什么问题，就不能不使用语言。苏联语言学家波罗夫斯基，曾经把钢针状的电极嵌入被试者的舌头或下唇的肌肉里，并要被试者分别用口算心算算同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结果在两种情况下，言语器官动作的电流记录完全相同。

正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所以著名哲学家、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395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没有很好掌握语言这一思维工具的人，其智力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限制。1920年人们曾在印度发现过两个在兽群中长大的小女孩。小的约两岁，发现后很快死去了。大的人们命名卡玛拉。她们从小就脱离了人类社会和狼生活在一起。她们没有语言，只会象狼一样嗥叫。卡玛拉被人发现时年纪大约已有七八岁，然而她的智力十分低下，她只懂六个月的婴儿所懂的事，实际上她只具有一般动物的“思维”。与她年龄相当的，在人类社会中教养出来的孩子，则能很好地掌握语言，而且会进行相当复杂的思维。本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曾在菲律宾的深

山老林里发现了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败逃的日本士兵。他离开人类社会孤独地生活了二十八年，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当人们发现他并要把他送回日本时，有人估计他不能过早地接触社会，最少要三到五年以后，否则他要发疯。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仅仅过了短短的八十一天，他就完全适应了人类生活并于当年结了婚，能象正常人一样地工作。这位离开人类社会几十年的日本士兵之所以能够这样，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在离开人类社会以前就已经掌握了语言。在离开人类社会以后，尽管无人与他说话，但他仍然能默默地用语言思维。语言是保持他智力的功臣。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一个人如果语言含混，思想也不会是清楚的。在相同的条件下，掌握语言的数量、程度是区分人们智力好坏的一种标志。

根据因素分析学的许多研究，智力的第一因子主要是语文能力（主要是词汇量），第二因子是数学能力。一个人对语言这一思维工具掌握的数量越多，程度越深，他的思维能力就越强。比如，一般的人写平常的文章只要用三千个词就够了，然而密尔顿用了八千个词，莎士比亚用了一万五千个。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杜甫，一生留下了上千首诗，在这上千首诗中，我们很少看到重复的词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许多作家的文章，之所以生动、形象、严谨、深刻，与他们的语言造诣高是分不开的。

从整个人类来说，掌握语言的数量、程度也是思维能力强弱的一种标志。斯大林说：“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

工作的结果，是人类思维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人类的思维日趋精密，这就推动了语法的日益完善和精密。比如在我国殷代的甲骨卜辞里，一些比较抽象的词还不够完备，例如人称代词还不完备，数词中还没有基数和序数的分别，介词和连词非常少。在句子中一般是单句，复句很少见，在复句中一般是并列句，主从句很少见。在词汇方面，甲骨卜辞中，词义的概括程度比较低。例如卜辞中有“犬、鹿、象、牛、虎、隹、鸡、凤”等许多动物的名称，但是找不到具有概括性的“动物”之类的总称。我们从这些语言现象中可以看出当时汉人的思维还比较简单、朴素，和现代的人相比较，智力是十分低下的。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进行语言教育（或学习），不仅是教会别人说话，而且还能教会他认识客观世界，同时还能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和思维训练。语言教育（或学习）是智力发展的体操。

比如，我们带着小孩到公园去游玩，指着菊花说：“这是菊花。”这不仅教了一句话，而且还教会了他认识菊花这一客观事物。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说：“菊花是供大家看的，不要摘，摘了别人就看不到了。”这不仅对小孩进行了爱护公物的教育而且还教给了他因果关系的推理。如果我们还能告诉黄巢的《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那么这又对他进行了知识教育，至少告诉了小孩菊花是在众花凋谢的秋季开的。

语言是脑的一种刺激信号，在所有的信号中，语言是最好的一种信号。巴甫洛夫说过，词对于人来说，正如其他一切为人与动物所共有的条件刺激物一样，乃是一种现实的条

件刺激物，可是词又是如此广阔丰富，这是任何其他条件刺激物所不及的。就以这一点来说，动物的条件刺激物无论在量上或是在质上都是不能与之相比拟的。

神经学告诉我们，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人脑如果长期受不到任何信号的刺激，大脑的思维机能就要衰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这里虽然是说学习与思考的关系，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句话也阐明了发展思维的一些道理，即，大脑要不断地受到新的语言信号的刺激才不至于罔，不至于殆。

人脑是由两套系统构成的信息加工系统。人脑左右两半球的机能不同。左半球主要是语言、逻辑、数字运算的加工系统；右半球主要是音乐、美术、空间的知觉辨认系统。这两套系统类型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经常地科学地进行语言教育和学习，左半球也就经常地受到语言信号经常性的刺激，得到经常性的综合锻炼，而越来越发达。角田忠信写的《日本人的大脑：大脑功能与东西文化》1978年出版以后，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许多议论。角田忠信声称，他所发现的是：一个人童年所学的语言会对大脑左右两半球发展其特殊功能产生影响。角田认为，大脑功能的某些差异是由母语决定的，而不是由本民族的遗传因素决定的。如果角田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每个人的感觉、认识、精神行为的形式就可能在幼年期间明显地受最能表现人的特点的活动之一——语言的影响。（详见美国《八十年代科学》1980年12月号）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掌握语言是开发智力的条件，语言教育（或学习）是智力发展的体操。我们要在本世纪内实现

四个现代化，除了要大力开发自然资源以外，还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智力。因此，了解以上几点，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皇帝与语言

——谈语言没有阶级性

日耳曼族的西几斯门德皇帝，有一天，用拉丁语向到会的代表发表演说。他在劝告出席会议的代表设法消除胡锡特派的分裂时说：“神父们，设法消除胡锡特派的分裂吧！”话音刚落，一个修道士就站起来纠正说：“陛下，‘分裂’这个词是中性呀！”西几斯门德非常镇定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修道士说：“是修道士亚力山大加鲁说的。”西几斯门德十分傲慢地说：“我是帝国皇帝，我相信我的话并不比任何修道士的坏！”这句话引起了哄然大笑，无论如何，这个词直到现在还是中性的。一个皇帝可以变更社会的法律、宗教、艺术等形式，却不能改变语言里一个词的形式。可见语言与法律、宗教、艺术不同，它不是上层建筑，也没有阶级性。

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这是由语言的本质决定的。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它对于社会全体成员来说是统一的，共同的，它是全民族的交际工具。尽管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行业和其他各种集团，然而语言对于他们是一视同仁的。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用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可以有阶级性，但所用的语言却是各阶级所共同

的，不论王公贵族，还是奴隶百姓，都得遵守社会的语言习惯，都不能占为己有。资产阶级肚子痛，他说的是“我肚子痛了。”无产阶级肚子痛，也只能说“我肚子痛了。”

人类的历史也证明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语言有阶级性的话，那么就应当有不同社会类型的语言，而事实并不是这样。语言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它的生命比上层建筑长，而且变化慢。一种社会制度消灭了，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随之消灭，而反映这种社会制度的语言却仍然可以保留。比如奴隶社会的“天子”“诸侯”等，在今天的历史著作中仍然存在。

要弄清语言没有阶级性的问题，首先要把阶级习惯语和全民语言区别开来。

在阶级社会里，语言没有阶级性，但各个阶级对于语言并不是漠不关心，而是竭力把自己的特别词语等强加到语言中去。比如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所谓“上流人物”“高等华人”说话时，满口“之乎者也”；他们把媒人叫“冰人”，把女婿叫“东床”、“乘龙”，把生子叫“弄璋”，把生女叫“弄瓦”等等。十七世纪法国贵族的“客厅语言”，把“日历”叫做“未来的记忆”，把“森林”叫做“乡村的美妙”，客厅女主人请客人坐下时说：“请你满足这把要想拥抱您的椅子的愿望吧！”正因为语言里有这些东西，因此，也就有人错误地认为语言有阶级性。其实这些阶级习惯语并没改变语言的全民性，因为它的构词材料仍然是从全民语言中借来的，它本身仍然是采用全民语言的语法规则。